

詩與書法個展，且於南華大學舉行有關詩與書法的專題演講、朗讀及座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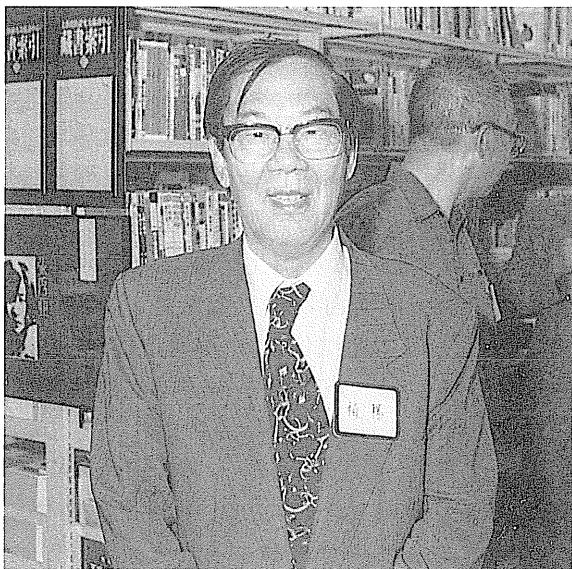
詩人多年來即以風格多變聞名，早年受西方超現實主義及存在主義影響，主張詩必須有世界性、純粹性與獨創性。當時他最負盛名的作品便是《石室之死亡》，其中表現強烈的宗教情懷，將生命意義、死亡及性等眾多複雜主題相互交融，以實驗性甚強的語言承載，風格甚為奇詭，引起當時台灣詩壇一陣驚嘆。

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末期，詩人詩風丕是一變，從原來唯尊的西方理論中抽身出來，向中國古典文學尋找新的靈感及表達技巧，企圖將傳統與現代、西洋與中國的思想精神結合，將現實與超現實融為一體，希冀能創造新的中國現代詩。被選為經典的《魔歌》適為此時代表，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長恨歌〉、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等，都被詩人用來重新創作，或是納入詩句中成為新穎的意象，充分實踐他對於詩創作的思考。

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大陸開放探親後，詩人自認他的詩又邁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緣由於他和《創世紀》詩友一同探訪大陸，和當地詩人交流，久違的故國山河給予他很大的震撼，眼見兩地人民生活方式的極大差異，興起為歷史作見證的企圖心，寫出更具民族風格、現實性強的懷鄉抒情詩，許多書寫故鄉景致如北京、長城的詩作，正是詩人沉澱後的省思，也讓他的詩風再翻一層，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歷史深度及情感。

詩人在最新的一本詩集《雪落無聲》中談到，自從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後，在心境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在白皚的大雪包圍中，讓詩人的心靈和自然景象契合一體，體悟到「一種由無邊無際的靜瑟和孤獨所渾成的宇宙情懷」，近於莊子所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在歲月的淘洗及沉澱後，詩人對於生命似乎又有了更進一步的開展。（陳國偉）

柏楊： 顛覆帝王史觀



王亞倫攝影

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一九九九年六月間在香港大學舉行。誠如共同策畫人李瑞騰教授所指，這場研討會由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召開，顯見「柏楊」已是亞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會中有人以柏楊和魯迅相提並論，從他們的小說中看出作家所欲表達的思維概念如何扣緊著飽受社會巨大壓抑而隱藏的幽暗心靈。

關於柏楊的小說，葉石濤曾點出《異域》是他最好的作品，這本書是柏楊於一九六一年以筆名「鄧克保」所撰寫的，它曾是台灣二十世紀最暢銷的報導文學，亦在《亞洲週刊》所公布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名列第三十五，文類的歸屬挑戰文學理論家。若論及柏楊畢生最重要的文學成就，則非《柏楊版資治通鑑》與續作中的《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

莫屬。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的鉅著，中國的歷史故事有三分之二源自於此。由於《通鑑》的編年體形式，使其體例猶如今天的報紙合訂本，舉凡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新聞，都可以從《通鑑》中查詢，只是在消息的連續性上，卻往往令讀者難以掌握。南宋袁樞因鑑於事件的開端儘管隱密不顯，然而結果卻可能呈現著強大的爆破力，所以致力於釐清樁樁大事的前因後果，以作為治亂興亡的對應之策，《通鑑紀事本末》於焉誕生。雖然袁樞並未在紀事本末體上加諸自我的主觀意見，柏楊還是從標題的脈絡中看出他的「動詞史觀」，亦即袁樞用：滅、篡、寇、討、禍等詞來表達他對這些歷史事件來龍去脈的看法。

至於柏楊本人的史觀一方面脫胎於司馬光、袁樞、王夫之等人，一方面又與體制內的史學閱讀產生歧異。他以邊緣人、民間作者的角度強力批判舊史觀，在極力掙脫大一統信念及忠君愛國的緊箍咒之後，將其對儒家系統與醬缸文化的批判結合八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運與政運譁代脈動的精神，形成其柏楊版的歷史觀點，在暢議解構與去中心論述的後現代社會，他用平等與尊重人性尊嚴的態度來重塑青史，其間所流露的旨趣自是司馬光、王夫之等人難以想像的。

《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的出版計畫將從一九九九年跨越到二〇〇一年，預計完成四十到五十冊的鉅著，如此磅礴的編輯出版大計，在即將跨世紀的現在，勢必為輕薄短小的文學形式，與速食消費的閱讀形態所考驗。無論如何，揚棄忠君封建思想的柏楊式史觀，已在中國史學的舞台上盡情揮舞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柏楊獲得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遠流出版公司也將出版二十七巨冊的《柏楊全集》，可知他的文學暨史學成就確實得到知音的掌聲。（朱嘉雯）

南方朔： 滿載星光的語言世界



劉楷南攝影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說：一個字裡就有一本文化史。為解釋一個字詞的來龍去脈，中外的語言學家往往在極力探索語言結構背後的價值觀與社會現象。近年來沉浸於語言世界的南方朔，即在此研究議題上體悟良深，他說：「人被賜予語言，其實也就是被語言所塑造，同時也等於被語言所囚禁。人們在不斷反芻舊語言的同時，也等於是在反芻著舊的歷史、舊的情境，以及舊的問題。」例如他在解釋「俠」這個字的時候，認為在儒家崇信差序格局的倫理秩序下，「俠」被營造成一種浪漫的烏托邦想像，使得人們對現世的不滿有所寄託，當傳統文人對「俠」懷抱著雙重情感的同時，「俠」亦成就了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提供知識分子「鄉愁」想像的作用。